

/ 全 / 球 / 文 / 化 / 系 / 列 /

当代



学术棱镜

译丛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超越文化转向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 等著
方 杰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主 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全球文化系列—

超越文化转向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 等著
方 杰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文化转向/(美) 比尔纳其等著; 方杰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4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04562-2

I. 超... II. ①比... ②方... III. 文化社会学-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315 号

*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rue
by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 1999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4-011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超越文化转向

[美] 理查德·比尔纳其等 著

方杰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83594756 传真 025-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56 千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4562-2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销售商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

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窠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序 言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数不多但正呈增加趋势的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研究。本文集的编者便是他们当中的成员。1984年,加州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辑一套新系列丛书,我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创立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系列。该系列丛书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正如我们在最初的申明中所陈述的那样: ix

编者们的希望资助出版那些将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著作,这种结合采取的方式不仅以具体经验为基础而且提供可靠的理论信息。过于经常的做法是将历史学问题的社会学层面在孤立状态下进行考察,而其文化层面要么被忽视,要么就被看作仅仅是一些其他更基本过程的反映,比如工业化和现代化。该系列丛书既不将社会和文化变革看作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也不认为它们是完全孤立的,而是要致力于探讨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之间在历史意义上的具体联系。这里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这个概念的,它包括对精神状况、意识形态、象征与仪式、高雅与通俗文化的研究。因此,本系列丛书将会吸收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两方面的著作,并且鼓励跨学科研究。

本系列丛书编辑出版的过程,正值新的令人兴奋的研究方法席卷历史研究之时,这些倾向我们现在一般都置于“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这种一般性的标题之下。⁽¹⁾尽管我们十分欣赏文化研究在使用文本和语言模型方面所取得的不寻常进展,但是我们依然相信,无论文化的分析方式还是社会学的分析方式,都不能彼此孤立地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富于想象的新方法将它们结合起来。

1994年4月,在本系列丛书推出十周年之际,我们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议题是“语言转向之后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当时,系列丛书已经出版23辑, x
应用了范围广泛的将社会史与来自语言学、文学批评、文化人类学的洞见结

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其他校园的15名同行，^[2]研讨会的设计是要重新考虑社会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回顾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所采取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1994年，十分具有刺激性的讨论促使我们在两年后设计召开了另外一次更详尽的研讨会，题为“语言转向时的文化研究：历史学与社会学”。我们邀请包括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内的十位学者准备论文，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宣读，参加讨论会的还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鲁斯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3]这次研讨会上激烈而又生动活泼的讨论，其结果便是本文集的产生，共收入9篇论文，加上编者撰写的一篇引言和海登·怀特所写的一篇后记。^[4]

自从我们发起本系列丛书14年来，已经出版三十多部专著。虽然历史研究领域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文化与社会（以及其他可能的）研究方式的结合，将会产生最为丰硕的成果。我们还继续坚持来自于不止一种学科的研究方法。然而，本系列丛书已经扩大了其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心。直到最近，在我们的系列丛中出版的著作完全集中在对欧洲社会的讨论上。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收入研究世界其他部分的著作，这反映了许多传统范畴的消亡，以及日益重要的一种全球性视野。

本项目获得了来自各种渠道的支持。加州大学出版社，尤其是谢拉·列文，多年来一直给予我们鼓励与帮助。加州大学出版社加上伯克利分校的国际研究所为1994年的研讨会提供了资助。伯克利分校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德·菲尔德曼慷慨支持与热情鼓励我们的项目，使得1996年研讨会的举办成为可能。我们还感谢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全体出色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吉亚·怀特和安德里亚·拉波尔特。斯拉夫与东欧研究中心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提供了必要的帮助。林恩·亨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南伯格教职提供了一些额外资助。

我们还想向与会的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充满兴趣地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提出许多吸引人的思想与建议。我们的前言承蒙格里高利·弗莱丁、玛格丽特·雅各布、威廉·西维尔、玛格丽特·萨莫斯和安·斯威德勒的评论而得到极大改进。最后，我们对海登·怀特不胜感激，他是1996年研讨会的一位重要参加者以及本书后记的作者。他热情洋溢地在本书中参与讨论这些问题，鼓励了不止一代学者进行文化转向。

[注 释]

- 1 1989年,林恩·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作为本系列的第6辑出版。
- 2 参加者有苏珊娜·巴罗斯、保拉·芬德伦、约翰·吉利斯、卡拉·赫希、汤姆·拉奎尔、谢拉·列文、埃瓦·莫罗斯卡、彼德·萨林斯、于里·斯列兹凯恩、安·斯威德勒、马克·特罗格特、吉姆·沃斯、雷吉纳尔德·泽尔尼克,以及本系列丛书的编者们。
- 3 提交论文的有理查德·比尔纳其、斯蒂芬·菲尔曼、玛格丽特·雅各布、卡伦·哈尔图南、雅各·雷维尔、索尼亚·罗斯、杰罗尔德·塞格尔、威廉·西维尔、小玛格丽特·萨莫斯和罗伊克·瓦昆特。参加讨论的包括凯斯·贝克尔、苏珊娜·巴罗斯、伊瓦·多曼斯卡、卡尔拉·赫赛、马丁·杰伊、谢里·奥特纳、彼特·萨林斯、安·斯威德勒、马克·特鲁格特、海登·怀特和雷吉纳尔德·泽尔尼克。
- 4 加罗林恩·拜纳姆的论文是根据《批评探索》1995年第2期(pp. 1—33)重印的。

引言

维多利亚·E.邦内尔 林恩·亨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中新的知识风尚一直不间断地迅速出现。尽管存在着诸多变异,直到最近,这些风尚一般可归属于两个宽泛的范畴:主张按照自然科学模式组织社会研究的研究范式,⁽¹⁾以及强调人的能动性和语境意义的属于阐释和释经学传统的那些研究方法。在这两个范畴中都有重要的学术著作问世,不过在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当中,主导倾向一直是提供一种社会解释的手段,而社会解释往往被理解为科学解释的一种——尽管并不完善的——版本。

1

无论是来源于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化理论的某种版本,大多数新的理论与方法都宣称自己尤其把握了对社会生活的主要原因(如果说不是其法则的话)的理解。其途径也许与先前的不同,但是结果和研究的假设依然大致相同。在这些假设当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是如下信念:跨学科的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科学最终的一体化提供了最好的前景。

在过去20年间,社会科学的信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于可能目标的科学探讨,或者至少是对社会生活的不偏不倚的解释,已经在各个方面受到质疑:社会科学受到批评,被认为既不科学又不客观,当然无权进行解释。不仅在被选作组织科学研究的范式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意见,而且这种研究是否应该组织以及一种整齐划一的范式是否是一件好事,甚至也存在争议。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学科性、政治性乃至道德基础,都存在十分严重的分歧。

许多不同的力量合在一起改变了社会科学家从事研究的领域。为了把握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发展的语境和意义,我们必须铭记在它们之前发生的一切。尽管知识的倾向很少能够归属于某个单一的原因——如果曾经这样做过的话,但很少有疑问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倡导“人权、反战、福利权以及妇女的平等权利的运动,将主体性与历史重新放回了议事日程”。⁽²⁾在那些年里,社会史学吸引了史学家中的许多实践者以及为数不多

2

但正在增加的历史社会学家。然而,到了80年代初,新的研究方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学,开始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语言或者文化转向。^[3]

要想确定某个单一的作家或文本促进了这种方向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不过倒是可以说,1973年出版的两本书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当中文化研究的转向产生了深刻影响。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指出,所有的历史文本,如果不考虑研究与方法论的类型,基本上是由作者以“一种诗性的行为”构造的。怀特吸收研究文学的学者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和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成果,坚持认为史学家思考的深层结构通过对一种语言模式的选择预示其研究领域。这种语言模式也就是一种比喻性的策略,它依次又形成研究设计的其他方面,包括情节设置和解释的方式。怀特可以被看做是正在进行之中的文化转向的“守护神”。^[4]

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非同凡响的《文化的阐释:论文选》也出版于1973年。^[5]这本文选包括原本于1957—1972年间发表的论文,对于社会科学家思考文化的方式有着独特的影响。格尔兹利用他作为作家的天赋表明,“人类文化是一个文本的集合体”,他认为,研究文化的任务是“运用符号学的方法进入我们的主体栖居的概念世界,以便我们能够在该术语的某种延伸的意义上与主体交谈”。^[6]格尔兹的著作导致文化研究领域一场理论与方法的再组合——从解释到阐释与“深描”(thick description)。因此,象征、仪式、事件、历史假象、社会调节,以及信任系统,被设计为有待对其符号学结构进行质疑的“文本”,这种结构也就是它们作为一个意义系统之组成部分的内在一致性。用格尔兹简洁的话表达就是:“我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都相信,人是一种悬浮在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认为文化就是那些网,而对文化的研究因此就不会是寻找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一种阐释科学。”^[7]

20世纪70年代间,当社会史学依然在吸引着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中许多热心实践者的时候,一大批开创性的著作的出现改变了关于“社会”与“文化”的概念。除怀特和格尔兹1973年的著作以外,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尤其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重要研究,改变了知识界

的风景。^[8]福柯的两部重要著作的英译本(《事物之秩序》和《知识考古学》)出版于70年代初,但是1977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的英译本,才第一次使得许多社会科学家接触他的著作。他关于话语的概念以及他“文化阐释的根本形式”,对社会科学家产生了尤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形式“将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结合在一起,它们是社会学家寻求摆脱原始主义的两种可供选择的主要的方法论”。^[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文化理论,尤其是那些带有后现代主义意义的,向社会学的解释发起挑战。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追随福柯和德里达,坚持认为共享的话语(或文化)如此彻底地渗透于我们对现实的感知,结果使得任何假定的对社会生活的科学性解释简单地变成了集体虚构化或制造神话的一次练习——在这种观点上,我们只能对我们的假设详加阐述,因为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客观、独立的真理。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直受到人们的攻击,可是当格尔兹和怀特出版了他们备受赞扬的著作25年之后,对文化的关注依然是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从事的许多研究工作的一个区别性特征。文化转向造成的后果,可以根据1996年的一篇回顾得到衡量,该回顾发表于美国社会学会的会刊《当代社会学》上,对“过去20年间十部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进行了评论。刊物的编者丹·克劳森在引言中解释说,编委会决心“集中讨论社会科学影响,包括对学术研究以及世界的影响”。^[10]这10本书中有3本属于基础研究的著作推动了向文化研究形态的转变,它们是格尔兹的《文化的阐释》(1973)、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7)和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纲要》(1977)。布尔迪厄对于社会学家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在史学家中是没有相似之处的,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当代话题——他将“惯习”(habitus)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引入社会科学词典,“在将文化研究带回到社会学研究之中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1]

文化转向以及一种更一般的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批判,也许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衰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面对这些知识倾向,作为一种阐释和政治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一直经受着严重的衰落。社会科学正在变成一种更一般的阐释的、乃至文学的活动——仅仅是只需要个别作者的艺术技巧而非一种通常更为有效的、共享的知识的另一种文化研究吗?^[12]

有些社会科学,至少在美国,已经证明十分反对后现代主义或文化批评。

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执著地守着他们的科学主张,前者采取的方式是强调数学的模式,后者则是强调他们与生物学的联系。理性选择的理论和形式上的模式对于政治科学家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对照,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更能接受文化转向,然而却并不采纳人类学家或文学批评家最极端的相对论或反实证主义的观点。我们在本书中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中间立场:那些被认为或者自认为确定无疑永远是科学的学科与那些将自己看做断然阐释性的、与创造性艺术密切联系的、明确不是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学科之间有时令人不自在的中间状态。

5 尽管文化转向已经横扫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的范围,这些学科的实践者并非总是在相同方向上前进的,而且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那么和谐。在六七十年代,史学家们得到鼓励从社会学,尤其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倡导的中层理论中汲取自己的理论。^[13]对社会学家而言,他们开始在这几十年间转向历史研究,而且许多人都被激发史学家的那种对社会史学的热情所动。^[14]然而,尽管史学家更深地卷入社会学,社会学家更深地卷入历史学,人们经常谈论的这两个学科的汇合依然难以捉摸。^[15]一些根本性的学科差异继续将史学家与历史社会学家分别开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家对外部测试、简洁陈述、社会理论运用以及比较研究特权所承担的义务。^[16]社会学家甚至比史学家更加强烈地坚持他们研究的科学基础,而且他们还莫名其妙地比史学家更不愿拥抱对文化的话语理解和从事对形形色色文化表征形态的研究。^[17]

本书的大多数撰稿者,如同两位编者一样,原本接受的是社会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方面的训练。^[18]他们大多数还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前几十年间的文化转向。因此本文集中的文章以及后记展示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正在如何与文化研究提出的问题进行搏斗。虽然这些作者没有开出具体的处方,可是放在一起看,这些文章确实指向文化研究当前关注的问题以及其未来可能的方向。

一 文化转向

6 要使得本引言符合这种语境,就需要简单地聚焦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社

会学和史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19] 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当然，我们也许可以简单地说“阅读下面这些文章等着不同的反应吧”，因为每个作者都对讨论的问题有着或多或少不同的理解。不过，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大致共同的线索：（一）关于“社会范畴”（the social）之状况的问题；（二）将文化描述为符号、语言和表征系统所引起的关注；（三）似乎不可避免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困窘；（四）解释范式的一种结果性的和也许是急剧的衰落；（五）由此产生的学科的重新排列（包括文化研究的兴起）。上述这些方面很难彼此孤立，而且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加强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困境，这一点很快就会明显呈现出来。

二 社会范畴之状况

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学两者都依赖于一种看似不言自明的关于社会生活本质的定义。^[20] 在其学科领域内，两个分支学科的实践者都很好地把握了他们的原始目的并从他们所反对的领域中汲取需要的东西。历史社会学家对只顾眼前的经验主义（对当前社会模式的量化研究）的社会学和依赖于形式的概念化而不是历史研究的理论抽象中的双重霸权产生怀疑。他们寻找一种在历史意义上差别更加细微的、比较性的基准来建立和测试社会理论。社会史学家发动战斗，反对传统学科将注意力聚焦于政治精英、政治研究报告、官方文件、党派政治与选举的做法。他们集中研究下层社会群体以及先前被忽略但也许能提供有关其信息的原始资料。

尽管出发点不同，历史社会学家和社会史学家却在社会范畴的使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使得这一点凸现出来的是社会理论创始者——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著作。工人和技工、国家的制造者和知识分子、社会异己和社会的被剥夺者——他们的理论与他们的目标不同，但是都提供了可以集中于历史和比较研究的社会范畴。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样假定，对社会群体、社会运动或者作为社会利益之表达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必然会阐明经济倾向、政治斗争以及宗教改革的作用。虽然很少人愿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将所有这些归结于生产方式中一种冲突性的位置，然而将个人的动机置于某种社会语境之中显然属于基本常识

的范畴。因此即使产业工人,比如,没有如同马克思预见的那样积极从事劳工运动,也肯定能够发现对于劳工积极性模式的其他的社会学解释。因为历史社会学家和社会史学家假定社会语境和社会属性给予了大部分西方现代生活可以辨别的意义,所以他们用于研究社会地位和社会干扰之效用的时间,远远多于他们质询社会范畴本身的意义或运作的时间。

好几种因素合在一起破坏了对社会学解释的这种信心。威廉·西维尔(William Sewell)在其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对“无懈可击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物论”的不满,以及其“生活的意义不只是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不懈追求”的观念。也许,最重要的是,以社会范畴的常识观念为基础的研究项目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数百万美元用于研究人口普查纪录,大规模合作努力研究从中世纪宗教秩序到19世纪集体暴力的影响范围的一切,以及千百万个人性质的研究,结果却得出自相矛盾而不是可以累积的结果。最后却证明,社会的范畴——技工、商人、妇女、犹太人——因地域和时代,有时甚至是年份的不同而变化。结果,依赖于社会范畴的量化分析方法一开始广泛运用就落下了坏名声(而且由于个人电脑的原因,就在它们变得真正切实可行时便被丢弃了)。^[21]

许多原来建议对社会范畴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也许尤其是史学家当中的那些,最终都背叛了他们早先的热情。有些人反倒将注意力集中于单一的经历和地点,也就是意大利人所谓的微观历史(microstoria)。在完成旨在探寻两个多世纪的长期的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趋向的踪迹而对法国南部农民进行的大规模研究后,伊马利·勒·罗伊·拉阿杜瑞以对一个村庄在面临宗教危机的特殊时刻的性风俗和家族冲突的生动描述引起公众的注意。纳塔利·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放弃她对16世纪法国里昂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社会差别的系统研究,转而研究著名人士的个人生活。即使是像查尔斯·提黎(Charles Tilly)这样的社会学解释坚定的捍卫者也开始撰写叙述史。^[22]同样的故事能够——并且——被一遍遍重复。社会范畴开始丧失其自动的阐释力。

三 作为一种符号、语言及表征系统的文化

由于对社会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局限感到灰心失望——即灰心失望于

有关社会范畴的一种常识性的通常唯物主义的观念——社会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开始转向文化的方向, 研究人(或者群体或者个体)的行动的文化语境。他们越来越经常地设计突出符号、仪式、话语、文化实践, 而不是社会结构或社会阶级的研究课题。^[23]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 他们往往转向人类学寻求指导。^[24] 这种语言转向后来先后得到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进一步推动。

有影响的法国人类学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许多洞见融合进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作, 推动了一场“符号学的革命”, 以不断增强的态势探寻所有意义的踪迹, 一直追溯到符号系统的作用(结构主义的“结构”)。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 文化本身可以像语言那样进行分析, 而且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包含在其中的往往无意识的或隐含的结构代码获取意义的。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宣称的, 这不仅是一个“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甚至包括艺术和宗教)是否只能够运用以及借助与语言学中使用的那些类似的概念加以研究”的问题, “而且是它们是否不构成其内在本质与语言的内在本质相同的现象”的问题。^[25] 人们通常都知道,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很快便宣称将从音乐到烹饪、从精神分析到文学的领域据为己有。^[26]

后结构主义(或曰后现代主义), 正如其名称暗示的那样, 源自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虽然它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法国形成, 但是在70年代随着福柯和德里达不断增强的影响才显得更加突出。后结构主义, 无论是福柯、德里达式的还是巴特式的, 即使在批评结构主义在强调固定的、描述极为详细的意义结构的同时, 也强调语言形成知识以及我们关于真实之理念的方式。不过结构主义一直坚持其客观、科学的地位(仍然依赖于实证主义的范式), 后结构主义则将其方法转向科学本身, 从而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提出质疑。按照后结构主义的观点, 语言或话语并不反映某种先在的社会理解或配置(positioning), 而且永远也不能进入存在的真实; 因为它本身设置了社会意义的表达并且充当人与其周围世界之间的一种幔帐。尽管存在种种差别,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都对社会范畴的全面位移转而支持被看作语言和表征的文化作出了贡献。社会范畴不是被想象为先在而是依赖于意识或文化或语言的。只有通过它们的表达或表征, 社会范畴才会产生。

四 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困窘

这种对语言和文化的强调不久便产生了更普遍的关于知识的一些棘手问题。如果文化研究如同格尔兹坚持的那样依赖于意义的阐释而不是对社会学解释的科学发现,那么把什么用做判断阐释的标准呢?如果文化或语言完全弥漫意义的表达,那么个人或社会代理(social agency)如何能够得到识别呢?福柯的两个特殊的研究场所,监狱或诊所,是由普遍共享的思想倾向而不是由根据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群体的利益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产生的吗?“文化”能够被认为是一个构成原因的变数并且独立于包括社会或机构范畴的其他因素运作吗?

为了将一个冗长、复杂的故事变得过于概略,文化转向有可能抹去所有对社会语境或原因的指涉,而且不提供任何特殊的判断标准来取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似乎更为严格、系统的研究方法。文化的方法一旦脱离它们先前的假定,似乎再也没有任何根基。^[27]

五 解释范式的崩溃

文化转向也许可以看做既是解释范式崩溃的原因,又是其结果。然而,在指责向文化的转向导致范式的崩溃之前,我们应该记住,文化转向本身产生于一种对范式的普遍不满,这些范式中许多是实证主义的,从19世纪以来一直把持着学术学科门类的建立。像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作为学科的史学和社会学的创立者通过明确以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工作的模仿对象的做法来证明其努力的正当性。也许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努力最终引起了不满,无论是来自那些认为社会科学不够科学的人,还是那些坚持根本不应该将科学性作为自己首要目标的人。^[28]

文化转向只是加强了崩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由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发的研究是由于自身负担过重而崩溃的:学到的东西越多,就越难以将那种知识整合到现存的范畴和理论中去。知识的扩充本身不可避免地鼓

励碎片化而不是在学科内和学科间统一。

六 学科重组

文化转向以及伴随而来的解释范式的崩溃,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文化研究”的兴起。这是一个覆盖一系列分析方法的术语,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甚至还有受英国马克思主义激励复活的唯物论研究的变体。⁽²⁹⁾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依赖于一系列阐释范式并且从根本上研究支配的问题,即权力的主张。文化研究的种种学科中不存在出类拔萃的,事实上,它们没有必然的学科中心。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够落入文化研究的问题之下,因为文化在其概念化中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几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个方面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所以因果关系的箭头可以同时指向任何和所有方向。在文化研究中,因果关系的解释如果确实有地位的话,那也是居于对权力的去神秘化和被解构之后的。

11

通过质疑社会范畴的核心概念,文化转向给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学出了许多难题,相当重要的是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问题。可是当两门学科的学者面临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崩溃带来的问题时,他们完全可能在社会的重新界定或复兴中再一次找到共同话题。尽管本文集中的作者全都深受文化转向的影响,可是他们拒不接受最激进形态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或后结构主义所暗示的社会范畴的灭绝。⁽³⁰⁾社会范畴的状况或意义可能值得讨论,对社会史学和历史社会学都产生影响,可是没有社会范畴的生活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

当然,尽管对社会科学解释流行范式的不满有助于推动向文化的转向,对文化转向某些方面的失望却产生了另一种方向的转移——不是向后面对先前对社会范畴的理解,而是向前面对着这个范畴的重新概念化。本文集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作为一种范畴的社会范畴本身需要研究: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怎样给予它如此的分量,以往的种种社会如何将它用做一种理解的范畴,这个范畴如何经历具体的行动并且通过它们得到再造?的确,决非偶然的是,许多年轻学者令人兴奋的著作现在聚焦于物质文化,这是一个文化与